



□ 卢 毅

老一辈革命家与“红船精神”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和阐释了“红船精神”，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并强调“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这就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内涵和历史地位。而“红船精神”最初的践行者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身上，“红船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创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

毛泽东早在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不甘流俗、敢为人先，他经常跟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得了个绰号“毛奇”。这鲜明地展现了他的创新精神。1919年，他又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显然反映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敢于担当精神。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更是将这种创新和担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经过不懈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建立了新中国，将红船胜利地驶向彼岸。

邓小平同样具有“敢为天下先”的非凡创新胆识，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1975年，邓小

平在领导全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期间，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他又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正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奋斗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就是因为有坚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关于信仰，毛泽东早年曾说：“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无疑为主张知、信、行统一。而他后来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好友周士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说明他此时尚未

确定自己的信仰。但到该年冬，他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后，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曾向斯诺坦承：有一段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周恩来同样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1921年初，他刚到法国时给表兄写了一封信：“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但到1922年初，他致信朋友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他还解释：“我认清 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直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大都是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比较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种信仰特别坚定，能够百折不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而那些中途掉队的人，就是因为缺少了理性思考的这个环节，所以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奉献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1918年，李大钊在比较了东西文明后明确表示：“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也说：“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周恩来留日前也书赠好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些言辞均充满了家国情怀，

显示了他们的初心使命。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登上“红船”，还为了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毛泽东年轻时就有感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为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后来，他更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刘少奇也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周恩来同样讲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他自己亦率先垂范，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100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同时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征途上我们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任务之重不容懈怠。因此，我们更要弘扬伟大的“红船精神”，再接再厉，迎难而上，“唯有一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红色记忆

中央党校的南院，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清初以来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都或多或少在这个院落里留下了印迹，南院像是一座历史博物院，见证着一件件近代以来中国的辛酸往事。

清初，皇室在北京西郊一带建造了许多皇家宫苑，圆明园是其中最主要的皇家园林。从雍正开始，圆明园周围又陆续建了很多的属园，自得园（原址位于现中央党校南院）便是其中的一个。

自得园是一座赐园，是雍正赐予和硕果亲王允礼的一座花园。允礼是康熙的十七子，因其忠心为国，操守清廉被雍正封为果亲王，管理工部、户部事务。雍正住在圆明园时，允礼扈从，颇受信任。雍正赐他一地，其址位于现在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并拨付内帑，建起了这处皇家园林。待园子建成后，雍正取“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赐名“自得园”，并亲自题写了“自得园”牌匾。雍正的这份遗墨至今仍在。允礼去世后，承袭者的爵位逐渐下降，自得园在咸丰年间被内务府收回。

自得园东西走向，呈长方形，园内有春和堂、静观楼等优雅建筑，台阁亭厦、错落有致，池广树茂、旷远明瑟，令人心旷神怡。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毗邻圆明园的自得园也遭疯狂洗劫，化为一片废墟。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整此园并改名为养花园，但是规模小了许多。园内有“上洞子花园”和“下洞子花园”（现中央党校南院89楼一带）。

现位于自得园西部的中央党校南院1至6号院，是清代升平署的遗址。清代自乾隆后的几位皇帝无不嗜好戏曲，宫廷里的御前戏班子叫作“南府”，“南府”原设在南长安街南口内路西，道光年间迁至圆明园的同乐园大戏楼，仍称“南府”。圆明园遭焚毁后，清廷又在自得园的西部建起了一排纵横连接的四合院、三合院，“南府”又迁至此地，与颐和园大戏楼隔墙相望，并改称为“升平署”。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将升平署的人员建制扩大到380余人。在光绪年间绘制的《西山名胜图》中的颐和园部分，可以清晰看到此处院落的风貌。

民国以后，自得园开始逐渐荒废了。

在自得园的北部，有一座建筑造型颇似老式螺旋桨飞机的楼宇（现中央党校南院90楼），人称“飞机楼”。“飞机楼”的原址曾是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宅院，卢沟桥事变后，佟麟阁将军奋起抗日，牺牲于南苑。日军占领西苑地区

南院往事

□ 谢煜桐

后，佟宅遂被拆。后此地被改为“伪建设总署土木工程学校”，建起了包括“飞机楼”等教学设施。1943年前后，又建了“飞机楼”东边的六栋两层小楼（现81—86楼）和一幢洋房。

抗战胜利后，自得园由清华大学农学院接收，成为清华大学农学院校址，现党校北院千草山下还保留着两块长方形小碑，这是清华大学农学院第一期毕业生所立，上书“母校留念”字样，并刻有47位毕业生姓名。

1949年10月15日，按照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签署的命令，清华大学农学院将房产移交给马列学院，从此这里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马列学院的校址。饱经历史沧桑的自得园，经历过封建社会走向末世，饱受了近代国势衰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创痛，终于迈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所在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自得园也从此迎来了新生。

党校史话



马列学院教学楼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 郭家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崇德、尚德的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奉为传统美德的精髓，不仅指导着人们立身行道、进德修业，而且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00多年前，孝、悌、忠、信等观念就为人们所熟知。《管子》一书提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人认为，如果失去了礼、义、廉、耻这“四维”，国家必将覆灭。到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的“四端”之说。西汉董仲舒又提出了“五常之说”，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成了当时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到宋朝时，人们愈加认识到了道德的重要作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放到了一起，形成了“八德”，也被称作“八行”或“八端”。“八德”自此流传下来，成为传统社会所提倡的人的立身之本。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儒家思想认为，在“八德”之中，孝是根，悌是本，忠、信、礼、义、廉、耻则是枝叶花果。

孝，简单来说就是“善事父母”。在中国人眼里，孝养父母是人的天性。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

儿女长大后自然要孝顺父母，这是人们知恩图报、饮水思源的回报意识，是重恩义、讲道义的行事原则。

传统孝德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也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养父母之身就是赡养父母，让父母衣食无忧。养父母之心就是除了尊敬父母外，还必须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父母唯其疾之忧”，即父母仅为儿女的疾病担忧，而不必为其他事情感到担忧。如果儿女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没有做到养父母之心，这就有失孝道。例如，与兄弟不能和睦相处，令父母担忧，是不孝，所以“兄弟睦，孝在中”。一个人要做到养父母之心，自然能够对兄弟友悌，做到“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另外，儿女做出背信弃义、傲慢无礼、不讲廉耻、言而无信等行为都会让父母担忧或者蒙羞，这都是不孝的表现。因此，一个真正的孝子必然是怀德守义、明礼知耻之人，不仅能够侍奉长辈，还力求自己德才兼备，让父母能够安心落意。作为官员，养父母之心还包括忠于职守、清廉公正等方面的内容。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不仅会令父母担忧其因违反国法而入刑，其所作所为还会让

双亲蒙羞，这也是古人常讲的“德有伤，贻亲羞”。如果一个人能念兹在兹，自然一言一行都会小心谨慎，时刻警醒自己，这样不仅不会徇私，反而会讲忠信、存礼义，珍惜名节。这就是古人所讲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养父母之志，就是《孝经》上所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如果儿女能够用自己的才识能力，孝养天下、造福苍生，父母亦能与有荣焉。通过以孝为根、以悌为本的修身，人们就可以处理好家庭及个人交往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做到讲信守义、明礼知耻，并且还能进一步为国尽忠，造福百姓。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孝悌之德。在古代的宗族家训中往往都会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教导。但除此之外，孝悌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于孝而言，要把爱父母的心推而广之，去善待天下所有的父母，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然后再进一步用这一颗仁爱之心去关爱全天下的人。于悌而言，要把对兄弟姐妹的爱推而广之，把身边的朋友、同门都作为兄弟姐妹来敬爱关心，甚至将所有友善的国家都视为

兄弟友邦，做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也正是因为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和文化接纳性，古老中国被誉为“礼义之邦”。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人”从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做起，然后爱其长上以及他人，进而“仁民而爱物”，直至“浑然与万物同体”。这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中国古人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成为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灵魂。

《论语·学而》篇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德培养了人们的爱敬之心，当这种爱打破血缘的界限，向外扩展之时，会使人自觉地生发出向善、向美的追求，生发出忠、信、礼、义、廉、耻之德。中国自古便有“移孝作忠”的说法。孝不仅指孝养父母，还包含着孝养天下的高尚情怀。古人所提倡的忠孝，也并非“愚忠愚孝”，而是以道义、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最终旨归。《荀子》中明确指出不体恤君主的荣辱，不考虑国家的命运，一味投合君主，苟且容身的人是“国贼”。可见，儒家推崇的忠君，并非是不顾道义、不论是非的忠君，而是协助君主“弘道”。另外，事亲之道还讲究循礼从

义。事亲以礼，是通过注重礼仪细节的周到来彰显亲情的可贵。同时礼贵中道，人们在礼的规范下恰到好处地行孝，比如规定“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教导人们不可过分沉溺于丧亲之痛，以致绝食损毁自己身体。当父母有过，子女从义而行，劝谏感化，如此才是行孝。事亲循礼、谏亲从义延展到社会上便是知礼守礼，德合乎义，延展到政治上便是崇德尚礼，合乎法度，直言直谏，公正严明。

总之，传统“八德”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体系，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理念和价值追求上都呈现出强烈的君子风格，比如重情道，讲信义，扬道义，讲究和而不同、包容并蓄等，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

